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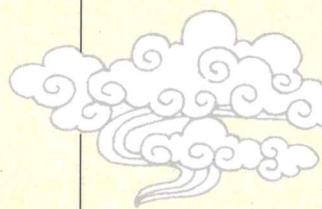
■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陈锋 主编

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 与社会变迁

■ 张建民 主编



■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陈锋 主编

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 与社会变迁

■ 张建民 主编

■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张建民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0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陈锋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ISBN 978-7-307-06221-4

I. 1… II. 张… III. 长江流域—社会变迁—研究—10世纪～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953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金诗灿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6 字数: 717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221-4/K·384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策划 陈广胜
主编 陈 锋
编委 张建民 陈文新 谢贵安 任 放

总序

陈锋

15至20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从萌芽、起始到发展、变化的时期。而长江流域又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施坚雅（G. W. Skinner）的区域发展理论，在明清以来中国的九大区域中，长江流域即占三个（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因此，对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加以综合系统的研究，展现长江流域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既可以推进渐次成为热点的区域研究和流域研究，也可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所借鉴。

迄今为止，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既有对该流域的专题研究，如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雪英、毛振培主编：《长江流域重大自然灾害及防治对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又有整体性的历史考察，如万绳楠等：《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7年版）。除了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外，更多的是对长江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区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以长江下游的研究最为突出，重要的著作如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湾嘉兴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版），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段本洛、张折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洪焕春、罗伦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范金民、夏

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致：《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长江上游的研究虽然没有下游地区那样繁盛，但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魏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朝贵、王炎主编：《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相对于长江上下游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当然，相关研究也一直在进行。还在1986年，就由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召开过“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讨论会”；会后，由黄惠贤、李文澜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以《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为名，198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198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牟发松的专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1996年，又有台湾学者黄致远的《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这些研究虽然偏重于魏晋隋唐时期，但已经表明学者们对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另外，陈钩等主编的《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版），是对一个省区进行专题性纵向研究的较早的成果。鲁西奇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对汉水流域进行了集中的研究。近年又有分省区的通史著作问世，如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的多卷本《湖北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这又从另一个层面标示出长江中游地区研究的多角度开展。在对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相关研究中，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2 年版），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及《汉口：一个中国的城市冲突和社区，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1989 年版），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陈钩、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吴量恺主编：《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及《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值得重视。

从总体上看，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研究的重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与区域研究的兴起基本上一致。由于长江流域分为下游、中游、上游三个区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应该说更多的具有区域研究的色彩，但长江流域毕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对长江流域的整体研究也许更为重要，但还存在着缺憾。在此基础上，由我牵头申报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试图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经过教育部专家组的论证，得到认可。但在课题研究的短短三年中，全面的系统研究几乎不可能，好在有研究群体的协作，才完成了这套书系。由于受研究时间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我们确定了三个努力的方向：一是从总体上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做专题性的论述，如《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二是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如《明清长江流域山区开

发与社会变迁》等。三是对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长江中游地区进行较为集中的探讨，如《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等。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的研究，在选题上都是前此学者较少涉足的，至少，我们的初衷是如此。当然，这套书系也只是我们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读者指导和批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课题的研究，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教育部社政司以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陈广胜部长等的关心和支持。在课题研究和成果出版过程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以及武汉大学出版社江建勤社长、张俊超副总编也给予了帮助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王笛教授，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等应邀提供稿件，也为本书系增色不少。

2003年5月29日

长江中游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拓新

（代序）

张建民

一般说来，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是认识、把握事物的两个基本观照点。如果仍然认可历史学是一门依据时间维度研究历史现象的学科，地理学是一门依据空间维度考察地表现象的学科，那么，至少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考察是缺一不可的。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相应的空间展开的，将历史现象放在产生它的空间（区域）中进行时空结合的考察，通过由此所形成的各种联系，探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变化的形成、意义及其机制，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内容显然会更加丰富多彩，也更接近历史真实。如若不然，不仅无法确切揭示人地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亦会受到局限。再者，诸多事例表明，历史进程不仅在时间序列上有发展的快慢进退之别，在空间结构上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世界范围内讲如此，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地域广大，自然、社会条件复杂多样，开发、发展先后参差，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诚如傅衣凌先生所说：“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和不规则的变化。”^①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如果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性，极易产生以偏概全甚或徒发空论的偏颇，这在以前号称“宏观”叙事的“综合”的研究中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且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基本共识^②，亦是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持续不衰的基本

①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学术界对区域史（区域研究）有不同的理解，或从“为了综合而区分”、“为了整体而局部”的意义上解读区域研究，或直接从方法论意义上视区域史为“整体史”。不过，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上的差别不应该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进行，“整体史”观不会忽视区域差异，“为了综合而区分”、“为了整体而局部”的研究亦不无方法上的意义。

动因。

毫无疑问，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进程也是复杂多样的。从认识论层面言之，人类认识乃不断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过程。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总是通过偶然性、随机性乃至千差万别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著名学者黄宗智论及中国经济史中的规范认识问题时指出：“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①微观研究应该有多种途径，如时间尺度上的、空间尺度上的、分门别类的，等等。而所谓偶然性、随机性、多样性的产生，总是离不开空间依托的，分区域的（或曰地方的）系统研究也正是空间尺度上的微观研究途径之一，注重考察、认识空间结构的差异与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变化轨迹及规律，“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②。当然，这里所说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都是相对的，因为即使考察同样的问题，站在不同的层面上，或使用不同的考量尺度，也会有高低、大小不同的视野，从而产生不一样的“观”感。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可忽视甚或放弃整体观照。如前所述，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主要前提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或曰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所谓不平衡乃整体观照下的不平衡，差异则更是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离开对整体和其他区域的观照、比较而孤立地谈某一个区域，平衡或不平衡也就无从谈起了。人们经常提到的区域特色或曰区域特征，更应该是在整体观照下，相对于其他区域而凸显出来的，而不是站在本研究区域立场上给自己粘贴标签。吴承明先生早已指出：“区域经济史研究，有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两个要领。一是由于划定区域，可将研究时段放长，探讨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阶段性或周期性变化。西方称为空间与时间（spacial and temporal）研究方法，近年颇为流行。另一个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比较，即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区域，而是以其他区域作为环境来进行考察，包括劳动、资本和产品的移进移出，技术的传播，以及扩散、互补、

^①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竞争等效应。”^① 这种纵横交叉、结合的方法，当为深化区域研究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视为一条尽量接近历史真相的途径，而不是以区域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为寻求区域特征，整体观照、与相关区域进行比较研究固然非常重要，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基础仍然是扎实、系统的本区域研究。换言之，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不能停止于就一个区域论这个区域，但必须从全面、深入研究这个区域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缺乏坚实的基础，进一步的解读、观照、提升、比较等，无疑将成为空中楼阁。

其实，大一统中国的史学研究富有重视区域研究的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精彩的经济史、社会史分区论述，习史者大多耳熟能详，至于中国地方志的普遍、长期持续修纂，自省府州县乃至乡镇，甚者至村，无不有志，就更是有力的说明，尽管地方志修纂与历史研究不无差异，地方史亦不等同于区域史。^②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高潮又一次兴起，虽然不能说已经没有“研究一个区域有什么意义”之类的疑问，却已经无法阻挡区域研究朝着更高层次深入发展。

就近些年言之，区域研究活跃、成果突出者如明清以来华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前者主要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参与，后者则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联合展开的。另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江南文化史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长江下游以及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史研究，四川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分别进行的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研究等，分别取得了显著的成果。^③ 这些研究都以不同层次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而且都在摸索适应本地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有的研究群体已积累了比较长时间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正在摸索出一条比较适合于本区域研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

^① 吴承明：《生产力经济史和区域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3页。

^② 关于地方史与区域史的异同，学术界多有探讨，研究区域的选择，尤其区域选择标准实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叶显恩教授认为：“区域史不同于地方史研究之处是其研究地域范围是根据题旨的要求来确定的，未必与行政区划叠合。其范围可以小到有经济、人文内在联系的某一山区或平原，也可大到按经济联系或有地缘关系的跨国地域。”邢寒冬：《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谈及21世纪历史学的命运——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叶显恩教授》，《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③ 此乃仅就大的区域而言，其实层次不同的区域研究成果甚多，恕不备举。

思考，甚或力图提出一些基于本地区研究的、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认识。同时，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学科交流、交叉，譬如田野调查这一方法或途径；就为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所认可、采用，而且开辟了搜集、利用新材料的途径，史料的种类和来源随之拓广，所谓“多重证据”的论证方法也较过去更为常见。

长江中游地区位于中国南北方交汇、东西部过渡地带，从气候到地形，都具有中间过渡特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野上看，它北邻中原文化，南接岭南文化，分别受到南北两大文化圈及巴蜀、西秦、吴越等文化的影响，同时亦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影响着周边相邻各区域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变动都与长江中游地区息息相关，留下了非常丰富的、不乏浓墨重彩的历史内容。远者不说，即以宋元以来言之，如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无湖不成广”的人口流动浪潮中，长江中游地区居于重要的中枢地位。如众所知，此次人口流动所及区域，远不止于谚语点明的江西、湖广、四川等数省区，江、浙、闽、粤、豫、皖、陕诸省无不波及，并由此拉动了大半个中国的人口。而且，人口流动浪潮带来的不只是中国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的变动，与此相伴随的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影响深远。再如从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换，说明的不仅是长江中游粮食生产、运销的重要地位，更隐含着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域资源开发、区域农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某种深刻变化。^① 如果需要，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地区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的地区。

然而，相对而言，长江中游的区域研究却是比较薄弱的，即就长江流域来说，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不仅不能和下游地区比，在许多方面也不及上游地区。有鉴于此，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较多地关注、探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努力想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在彭雨新先生的指导下，我们首先从水利问题入手，当初的基本思路是：农业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占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农业的发展与水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农业水利是考察、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后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学术研究领域的内在脉络也在自然延伸、贯通。如由研究水利而关注水、旱等自然灾害，因为水利与水旱等自然灾害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用水之利”与“去水之害”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割裂开过，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兴利与除害并举、水土兼治为特征的系

^① 参见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兼及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张家炎《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等。

统治水的思想。再如由研究平原湖区而关注周边山区，江河中下游平原之水问题与上游山区之来水来沙息息相关，以此为基础，无论自然因素还是社会条件，上下游之间、山区与平原之间就建立了无法割断的联系，尤其中下游平原之于上游山区更是如此。山区（高地）与平原（低地）之间不仅有水沙流动，而且有人口流动、能源流动、资金融通、产品交换等，于是有涵盖区域人口流动与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社会变迁乃至环境演变等内容的综合研究。先后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长江流域农业水利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等十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版、发表了《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彭雨新、张建民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研究成果，^①同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详见附录）。

作为这方面继续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共同举办了“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珞珈山麓，围绕历史上长江中游地区的开发与发展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会议论文及讨论所及，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区域环境演变与历史自然灾害，宗族、聚落与社会组织，移民、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法律、社会风俗与社会控制，公益事业（社会救济、灾荒救助等）与水利灌溉等公共领域，城市环境与城市空间、功能，近代城市与市场网络，民族地区经济等。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亦有探讨，如对区域划分的标准与模式的论述，“地方性知识”概念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对“民间文书”性质的认定及其解读等。其中有的是全新的研究课题，有的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提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多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甚或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某些空白。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论文对新史料的发掘、利用也颇为重视，一批民间文献包括各类碑刻、案卷、家谱被发现并运用到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实证中，如《华陂堰簿》、《槎滩碉陂山田记》、《槎滩碉石陂事实记》、《五彩文约》、《钟九闹漕》、《民间案卷》、《华国堂志》等。这些民间文献与相应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对相关研究主题的深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展现了很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新史料利用前景。如众所知，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古老的历史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摄影、扫描、计算机等技术的普遍运用，使许多过去不容易看到、甚或无法看到的文献比较容易看到了，过去很难甚至无法辨认的文

^① 近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的相关研究机构在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亦取得了显著成果，值得关注。

字，现在能够辨认了。这种变化也给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要拓展、出新、进一步提高水平，除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外，作为实证研究基础的史料的发掘，特别是非传统文献类史料（包括口传史料）的发掘利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明清以来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民间文献如谱牒、碑刻、契约文书、书信、日记、村落文书、民编启蒙教材、民间宗教的经文案卷、祭文本等，有别于以官方或社会精英话语为中心的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如正史、实录、朝廷档案、政书、地方志等），由于它们主要来源于民间，直接反映或贴近基层社会生活，而且包含有几乎涵盖民间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内容，因此可以弥补以往“大历史”、“宏观叙事”类研究中普通民众声音缺失、对基层社会如何运行不甚了然等不足，可以说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追求像过去关注朝廷、官府那样关注民间，像过去关注上层那样关注基层，像过去关注精英那样关注大众，像过去关注重大事件那样关注日常生活提供了资料条件，有利于拓展、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当然，这里讲重视非传统文献、民间文献的搜集、利用，并不是要忽视甚或放弃传统文献、官方文献。恰恰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只有将上述两种文献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参证，相互观照，才可能获得对社会经济史相对真实、完整的理解。

此次研讨会和该论文集的出版，肯定会对长江中游区域社会经济史、环境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问世。

2007年8月于珞珈山

目 录

长江中游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拓新（代序） 张建民 1

第一编 区域环境与经济

经济史学研究中区域划分的标准与模式 赵德馨 3

对于清代雍正年间政府官员考察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的解读

..... 陈支平 8

清代后期秦巴山区的水环境与水旱灾害 张建民 17

湘籍人士论近代湖南自然灾害频仍的原因 杨鹏程 53

都市环境史的一页：18世纪汉口地区的黑山开发和风水论

..... 郑哲雄 62

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洲演变 尹玲玲 76

明代土司地区的赋役征派

——以贵州宣慰司为例 温春来 90

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农业发展 李倩 104

第二编 宗族 聚落与社会组织

从“异民”到“怀远”

——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

..... 梁洪生 115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

——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徐斌 149

文本与权力：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历修方志分析

..... 谢宏维 162

土地革命前夕赣南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与社区关系 饶伟新 187

论晚清湖南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变迁 王继平 肖华 222

第三编 信仰 风俗与社会控制

隋唐五代天台宗的地理分布	张伟然	黄菊	239
弥“盜”、党争与北宋虔州盐政		黄国信	257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与地域文化的转移		方志远	286
从“解钱粮”习俗透视明清苏州地区的城乡关系		吴滔	317
明清长江中游地区风俗的变迁		王美英	330
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			
——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		张小也	346
母亲、妻子与女儿：民国鄂东妇女财产权初探		付海晏	364

第四编 城市空间与市场发展

“双子城”：明清时期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的空间形态		鲁西奇	379
近代开埠与宜昌社会变迁（1877~1926年）		黄长义	396
竹枝词所见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扩张		任放	404
九江开埠与江西区域市场的转型		张芳霖	420

第五编 公益事业与水利

乾隆五十三年的荊州大水及善后		徐凯希	453
清代两湖地区育婴事业的运营和演变			
——以江南地区为参照系		周荣	464
清初鄂西北流民及其救助			
——以俞森《鄖襄赈济事宜》为中心		祁磊	483
明清时期鄂南乡村的水利组织与民间秩序			
——以崇阳县《华陂堰簿》为中心的考察		杨国安	496
生态、社会变动与制度变迁			
——以清代江南海塘善后制度为中心		王大学	521
水利、宗族与地方社会			
——以道光三年泰和县槎滩陂创建权属纠纷案为中心		廖艳彬	539

附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有关明清时期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史研究概况	551
后记	555